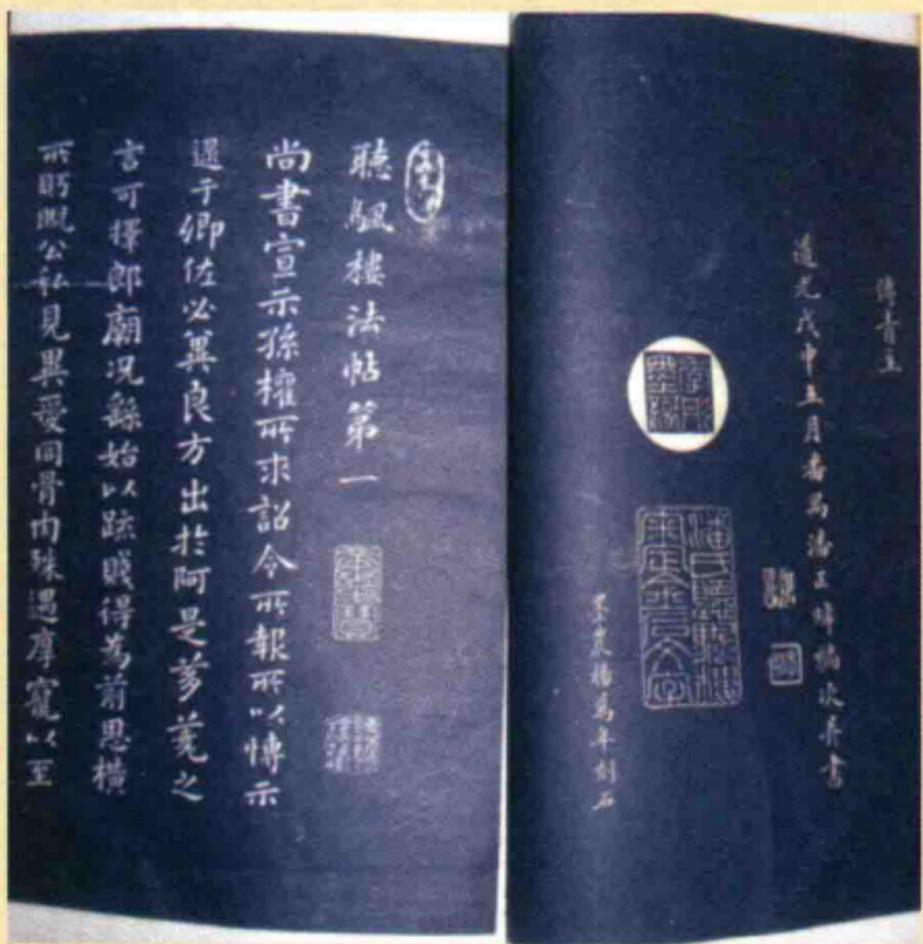


今人所见的《听帆楼书画记》是由《听帆楼书画记正编》和《续刻书画记》两部分组成，对所录书画逐一释说，先注明绢纸、尺寸、印记、书体等，次列全文，继载题跋。潘正炜在目录中记录了每卷书画绘制的年代，凡为自藏则说明购入时的价格，借用别人的藏品也加以注明。

潘正炜擅于书法，后来听从好友吴荣光的劝说，将其收藏的书法藏品，选编为《听帆楼法帖》刊刻。吴荣光因常到听帆楼欣赏书画藏品，鼓励潘正炜著书付印。道光二十三年（1843），吴荣光在为《听帆楼书画记》作序中说：“余辛丑（1841）归里，每以书画自娱。尝取数十年来曾经鉴赏者，编成一帙，名曰《辛丑销夏记》。继而棹访潘季彤观察于听帆楼。备阅所藏，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即选数种刊入《销夏记》中。惜美不胜收。劝其校辑付刊，以公同好。今春，季彤《书画记》成，属序数言，以弁其首。季彤读书好古，寄迹风尘，廿有余年，而能专精所好若是，则斯记也。”可见，吴荣光对听帆楼鉴藏的书画品质相当认可。《听帆楼法帖》卷首盖有“正炜”“季彤”“季彤墨缘”“潘氏听帆楼审定金石文字”等印鉴四枚，并注有“墨农杨万年刻石”字样。《法帖》收录了自魏晋唐宋元明各时代90多位书法家的墨宝。吴荣光为该书作跋。

潘正炜收藏的这些珍贵书画，也是因为其拥有雄厚的资财，但他舍得将大量的金钱用于收购自己喜欢的古代书画，并不惜重金精选刊刻。清代张维屏在为潘正炜收藏的《赵孟頫帖》作跋云：“此卷为松雪渊明像，每书数行为渊明事，卷首有慎王题‘高风妙墨’四字，卷尾有皇太子题诗一章。当是藩邸所藏，不知何时转至岭外。去冬，友人携至余斋中，适季彤观察过访，一见心赏，不惜重价



《听帆楼法帖》刻本





购之。且摹刻数则，以公同好。”这种不惜重价，一方面说明其有财力，另一方面说明具有品鉴的才华及其收藏嗜好。据说听帆楼收藏的《明人金扇集册》，集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陆治、吴彬、魏克、吴振、陈焕、姚允在、王綦、高阳等明代十二家所作山水、人物金笺扇面于一册。

潘正炜去世后，听帆楼的藏品多为广州孔氏家族的岳雪楼收藏。广东著名女学者冼玉清教授在《广东之鉴藏家》《广东丛帖叙录》二书中高度赞赏潘正炜的听帆楼说：

吾粤鉴藏之风，嘉道后始盛，大抵游宦京沪者，受被都风雅之影响，始事蓄聚。吴氏筠清馆倡之于前，潘氏听帆楼、叶氏风满楼、孔氏岳雪楼继之于后。留存著录，彰彰在人。以后激流扬波，此风益炽。

潘正炜的听帆楼在当时及其后世，对中华书法文化的保存与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潘正炜在收藏古文物的基础上开始研究著述，留下的著述除了前述《听帆楼书画记》和《听帆楼法帖》外，还有《听帆楼古铜印谱》等。

《听帆楼古铜印谱》是潘正炜根据听帆楼所藏潘有为收藏的古铜印研究撰成。潘有为出身进士，博学多闻，精金石、彝鼎，醉心于搜罗古钱、古印、书画、彝鼎等珍藏，开广东鉴藏文物珍品风气之先河，是乾隆年间岭南鉴藏家之魁首。冼玉清在《粤东印谱考》中按鉴藏时间顺序将潘有为的《看篆楼印谱》排在广东印谱首位，视为广东盛行辑印古印谱之始。嘉庆年间，潘有为将其印章藏品拓为《看篆楼印谱》，看篆楼是他为藏古铜印的处所。潘有为死后，所藏古印大多归潘正炜所有。潘正炜在《看篆楼印谱》基础上拓刻成《古铜印谱》。此印谱又称为《秦汉铜章撮集》，是潘正炜从所藏古铜印 1700 余枚中挑选精品拓刻而成，两广总督百龄、广东按察使杨振麟等为之作序，著名学者吴兰修作跋。我们从杨振麟的序中可以管窥听帆楼收藏印谱之状况：

番禺毅堂先生藏汉魏六朝官私印千余枚，今归从子季彤观察，编为《古铜印谱》三卷。以红泥拓之，古朴浑厚，亦钟鼎款识外一宝玩也。余谓此本宜拓一千本，分散人间，庶几与金石文字，并垂不朽，岂曰识小乎哉！

而吴兰修所作的跋，更显示潘家收藏印谱的文化价值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因为这些汉魏时期的作品在以后的朝代中已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余尝谓印章与隶书盛于汉，坏于唐。宋元以后愈趋愈下，迨本朝而后复古。……潘季彤年丈以所藏古铜印千方，用红泥佳楮拓之，古人刀法、章法、字法，灿然具在。……往者毅堂先生曾拓之曰《看篆楼古铜印谱》，今曰

听帆楼，各随所度以为名也”。《听帆楼古铜印谱》后被潘仕成拓为《宝琴斋印谱》传世。

潘正炜以“听帆楼”命名的著作，至今仍被鉴藏界视作珍贵文物。《听帆楼书画记》刊于1843年，《听帆楼续刻书画记》刊于1849年，两书合刊于1901年。1910年，黄宾虹、邓实主编《美术丛书》将《听帆楼书画记》《听帆楼续刻书画记》收入其中出版。以后又不断得以重刊。1997年，两书又分别收入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画全书》第11~12册。2007年位于浙江杭州市的西泠印社又影印出版了《听帆楼书画记》，2008年台湾的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也出版《听帆楼书画记》。2009年，邵大箴编纂的美术工具书《中国美术百科全书》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也收录多条与潘正炜有关的词目，成为书画收藏家的案头工具书。听帆楼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其声名犹存。潘正炜后人、世界华人建筑师创会会长潘祖尧先生即以“小听帆楼”作为他在香港收藏文物的室名。

可见，潘家虽为十三行行商，但其富而好儒，亦商亦儒。他们利用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广收书画、金石、彝鼎、古印等，建造听帆楼陈列存放，并进行研究，著书立说，所以有“伍氏喜刻书，叶氏喜刻贴，潘氏独以著作传”的说法。

四、徐润创办石印书局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以石印、铅印为标志的西方印刷技术被引入中国，使用范围不断扩展。石印是人类印刷史上一次重大革新，具有制版快、印刷快、逼真、廉价等特点。这一技术于道光十三年（1833）前后传入广州，并



徐润像





逐步传到上海。这大大刺激了中国商人，而且外国商品外包装鲜艳美观，与中国商品单调的红纸黑字包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广东商人最先对此做出反应，并付诸行动。这个大商人就是徐润。

徐润，别号愚斋，1838年出生于香山县（今珠海市北岭村）。15岁时，随叔父徐荣村来到上海，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因其勤奋好学，颇有悟性，深得洋行上下各级人员的喜爱与重视，19岁那年就已获准上堂帮账，24岁时升任主账，不久就接任副买办之职。早在宝顺洋行上堂帮账时，徐润就已经开始开办“绍祥”商号，自行经营茶叶等生意，从内地收购茶叶、生丝等物品，然后转卖给上海各大洋行。1868年，徐润脱离宝顺洋行，在上海开设“宝源祥”茶栈，随后又在湖南、湖北等产茶区增设多个茶栈，构造出庞大的茶业采购与销售网络，被誉为“近代中国的茶王”。19世纪70年代，徐润敏锐地看到上海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地价将日益腾贵，在经营茶业的同时，开始投资房地产，先后和华商、外商合创了上海地丰公司、宝源祥房产公司、业广房产公司、广益房产公司、先农房产公司等，成为华商中的“地产大王”。经营茶业、房地产等积聚的雄厚资本，为徐润投资印刷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石印技术是德国人于18世纪末发明的平版印刷法，主要方法是用药墨将文字写在药纸上，再将药纸上的字迹移置到石板上，然后滚刷油墨便可把字印在纸上。19世纪初，石印技术已在欧洲普及。中国采用石印法最早是光绪二年（1876）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创办的土山海印刷所，主要印制天主教的宣传用品等，印刷数量有限，且仅限信徒之间传布，社会影响有限，但对中国石印技术的引进具有重要意义。1879年，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设立点石斋印书局，用石印技术开印《圣谕详解》，后陆续印制了《康熙字典》等书籍。特别是其印刷的《康熙字典》十分畅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销量达到数十万册，获利颇丰。点石斋通过印刷书籍获得厚利，使中国商人大受刺激。

中国商人开始对中西印刷品进行观察与比较，发现二者迥然不同。石印不仅字迹清晰，亦可随意缩小放大，甚为先进。外国商品外包装色彩鲜艳、十分美观，而中国印制的产品多采用红纸黑字，设计单调，缺少美感。“酷嗜图籍”“藏书富有”的广东大商人徐润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并通过点石斋印书局看到了发展印刷业的无穷商机，遂于1882年与徐鸿复等人 在上海集股投资创办同文书局，从国外引进12台轮转印刷机，雇工人500名。这是中国人自己集资创办的第一家石印书局，试图通过实际行动改变中国印刷业的现状。

同文书局是中国人自己集资创办的第一家石印书局。同文书局局址设在当时上海的熙华德路（今长治路），是一家专门翻印古籍文献、书画碑帖的印刷机构。书局拥有先进的技术条件和设备，拥有石印机 12 部，雇员 500 人，聘请翰林出身的出版主持和举人或秀才出身的编校人员专事翻印善本古籍。机器设备有 6 度、12 度、26 度字粒机及石印机、照镜机等。经营范围比较广泛，除印刷商品包装纸外，还印制书籍、画册、香烟盒等。先后出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及字画、碑、帖，不下数十万本，各种法帖等十数万。同文书局的规模居当时石印业之首。光绪十九年（1893）五月十七日，该局不慎发生火灾，大批设备被焚毁，损失惨重，但从事过保险业务的徐润在开办之前已经为书局办理了保险，所以书局又很快恢复生产。后因印书积压大，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停办。

同文书局在近代印刷史上率先打破了由外国人创办的点石斋印书局独霸石印业的局面，并与宁波人在上海创办的拜石山房书局形成了石印业的三足鼎立之势，推动了中国石印印刷业的发展。光绪十三年（1887）二月五日《申报》报道说：“石印书籍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所谓“宁粤各商”即是指宁波人开设的拜石山房和广东人开设的同文书局，“而新印各书无不钩心斗角，各炫其长，大都字迹虽细若蚕丝，无不明同犀理。其装潢之古雅，校对之精良，更不待言。诚书城之奇观，文林之盛事也”。可见，广东商人在近代中国石印技术推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文书局石印技术的引进，使得中国书籍的出版速度与质量大为提高，同时也使得书刊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这无疑有利于文化普及。徐润在记述引进石印技术开办同文书局时，对石印技术大加赞誉：“石印书籍始于英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石上，字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如人意。心窃慕之，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正是石印书籍的明显优势，吸引了徐润等人集股兴办同文书局的热情。

同文书局自 1882 年创办，到 1898 年歇业，短短十几年，用石版印刷术印刷了大量古籍，因印刷精湛、装订考究、字迹清晰，被时人称为“同文版”。同文书局搜罗古籍善本为样本，专用石印技术影印古籍，所印书籍包括《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辑览》《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全唐诗》《子史精华》《康熙字典》《快雪堂法书》等数十万本，各种法帖、大小题《文府》等数十万部。其中工程最大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和殿版《二十四史》。





同文书局曾前后两次翻印《古今图书集成》，第一次开始于光绪十一年（1885），用两年时间印刷《古今图书集成》缩印本1万卷，计1500部，因是缩印本，所以字体较小。第二次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由清政府出资影印了100部。此次影印增加了《考证》20卷，每部装订成5440册，总计50多万册。工程之浩大，成为当时印刷界的重大事件，同文书局也因此声誉益隆。

《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型类书，全书1万卷，目录40卷，雍正四年（1726）定稿成书。清末曾两次翻印，一为石印本，一为铅印本。同文书局在“股印《古今图书集成》启”中说：“恭闻是书初成，以活字钢版排印不逾百部，……本局现以万余金购得白纸者一部，用以缩印，又以六千金购得竹纸者一部，用以备校，约两年为期，其工可竣。”所谓“股印”，即指图书未出版时，购买者先交付给出版机构一定数量的订金，余款在图书交付时付清。

关于同文书局印行该书的目的，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是朝廷由总理衙门出面委托上海同文书局，花费白银35万两，石印《古今图书集成》100部，作为赠送外国的礼物。另一说是朝廷作为恩赏王公大臣的礼品，据说慈禧太后为了颁赏文臣，拟翻印《图书集成》100部，徐润得知消息，随通过各种关系而得到内务部批准，承揽了该项业务。1891年，清政府出银48万两，委托同文书局承印《古今图书集成》，底本为清雍正年间的铜活字印本。同文书局所印《古今图书集成》板式比原书放大十分之一，用上等桃花纸石印，对原有脱漏之处均进行描补，其中一部用黄绫团龙装订，以供宸览，其余百部则普通装订分发文臣。此书印制工程浩大，历时3年，耗资甚巨，官府早期拨给38万银两不敷支出，印刷几经中辍。经徐润托人游说，官府增加津贴10万，印刷经费最终得以解决。徐润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曾说：“迨光绪十七年辛卯，内廷传办石印《图书集成》一百部，即由同文书局承印。壬辰年（1892）开办，甲午年（1894）全集告竣进呈，从此声誉益隆。”同文书局从此声誉益隆，此后，陆续在北京、广州、太原、南昌、长沙、汉口等地设有分局，一时成为中国石印业巨头。

同文书局翻印的《二十四史》共3249卷，约4000万字。清代刊印的全套《二十四史》主要有三种版本，最早是清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刻本，其次为清末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苏、湖北五个书局合作刻印的“局本”和商务书局的“百衲本”。同文书局在光绪十年（1884）发布的“股印《廿四史》启”中曾称：



同文书局《康熙字典》

本局现以二千八百五十金购得乾隆初印开化纸全史一部，计七百一十本，不敢私为已有，愿与同好共之，拟用石印，较原版略缩，本数则仍其旧。如有愿得是书者，予交英洋壹百元，掣取收条，并分次取书单念四纸，各史随出随取，而得其便。现经添设汽炉，日不停晷，较诸人力尤为敏捷。

由此可见，同文书局翻印的是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当为齐全的珍本。由于出书快、工本低，售价也比木刻本低廉许多，自然也受读者欢迎。

此外，同文书局石印的古籍影响较大的还有 160 卷的《子史精华》、450 卷的《渊鉴类函》、240 卷的《骈字类编》、120 卷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和《康熙字典》等。书局还出版了大量西学图书，广为发行流播。李鸿章赞其“掺罗海外奇书，彰阐中西新学”。如今中华书局畅销不衰的影印《康熙字典》，所依底本即是同文书局仿殿版的石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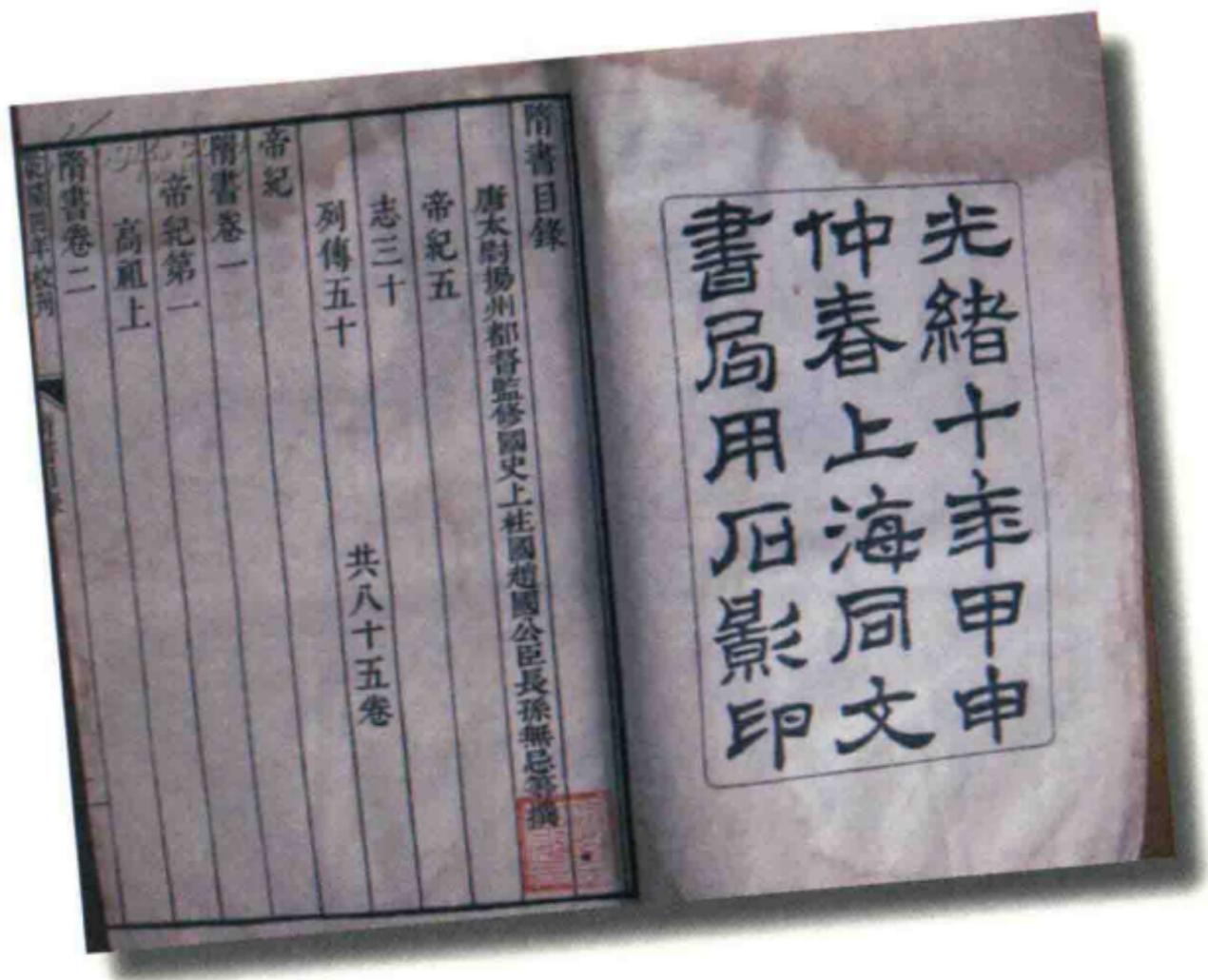
同文书局和其他石印书局的出版内容，一是为科举考试中的





士人服务，推出了各种经书及《大题文府》《小题十万选》等出版，供士人选择购买使用。随着科举考试增加史鉴策论的内容，书局加大印刷《二十四史》《九通》《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佩文韵府》《全唐诗》《康熙字典》及各种论说的书籍；二是投迎大众读者的需要，如印刷的字画、诗文碑帖等主要是迎合赏玩古董之人，而对旧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的石印，则是投广大市民之所好。后来由于销路的不畅，徐润果断决定停止石印业，他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说：“惟十余年后，印书既多，压本愈重，知难而退，遂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停办。”

清末出版的书籍大部分采用石印技术，石印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同文书局专用此法影印古籍，已成为时代楷模，并成为印刷行业的领头者，其意义远远超出其当初设立的宗旨。徐润创办的同文书局是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印刷企业，为传播近代文化知识、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作用。



同文书局影印本《隋书》

第二章

报刊与出版





报刊与出版无疑是近代化过程中传播信息最为快捷的媒介，其阅读对象主要面对社会大众，所以其发行量的大小，不仅涉及营销商的经济利益，而且也会为他们带来社会效益。所以，投资近代化的报刊和出版，也是粤商乐于尝试与开辟新的商业渠道的手段。

一、《广东七十二行商报》

广东是最早出现近代报刊的地区。清末民初，广州商人对办报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当时大多数报纸都是商办或有商业资本参与开办，其中较有影响的商人团体报刊即为《广州总商会报》和《广东七十二行商报》。这两种报纸直接以商人团体来命名，一方面反映了商人在运销过程中知晓舆论对商业兴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行业报刊又可以团结更多的商人抱团发展，以争取更大的商业利益。其中又以《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出版时间最长。

《广东七十二行商报》的创办人是黄景棠。

黄景棠，字诏平，广东新宁（今台山市）人，生活在清末民初。他的父亲黄福是马来西亚著名侨商，在马来西亚柔佛承包工程并经营种植园，财力颇雄厚。郑观应曾用“富埒王侯”来形容黄福。黄景棠的幼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度过，但接受的是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少年时已经奠定了扎实的知识基础。由于视野开阔，年轻时多接受外界新思想的影响，立志将来要有所作为，成就一番宏伟大业。

黄景棠青年时与其弟一起归国寻求功名。大约在1888年，在父亲的支持下，他回到祖国，在广州继续求学，此后便在羊城广州定居下来，曾于1888—1889年北上游历了京、津